

哲学维度的中西翻译学 比较研究

曾文雄 著



科学出版社

哲学维度的中西翻译学 比较研究

曾文雄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维度的中西翻译学比较研究 / 曾文雄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03-038227-6

I. ①哲… II. ①曾… III. ①翻译学-语言哲学-对比研
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3743 号

责任编辑: 阎 莉 常春娥 / 责任校对: 刘凯晶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联系电话: 010-6401 9007 电子邮箱: changchune@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 A5(890×1240)

201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7 7/8

字数: 248 000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
规划项目(08k-07)”资助。

前 言

“翻译之所以存在，由于人们讲不同的语言。”(Steiner, 2001: 51) 正是因为翻译的存在，使得人们之间可以进行思想交流。无论在远古还是在当代的人际交往中，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知识和价值观的传播、民族语言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建构、融合与创新中起重要的作用。“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不少进展都是源于外来知识的冲击，令社会、文化和知识系统产生巨大的变化，终于使整个文化系统面貌一新。由于知识的传递主要依赖语言为工具，外来知识的输入明显地牵涉到外语，所以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我们甚至可以说，世界上各主要文化系统的发展都和翻译活动脱离不开。”(孔慧怡, 1999: 序)毋庸置疑，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翻译之功，诚远大矣”。(道宣, 2009: 71)

中西翻译活动、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据现有资料记录，《越人歌》为中国最早的翻译例证，《周礼》也成为最早记录翻译活动的文献之一，具体的译作可追溯至东汉《四十二章经》的翻译。在西方，《圣经》里的故事描述了世人持一样的语言，协调合力共建通天塔，但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使“通天塔”(Babel)无法建成。这个故事意味着，人们可以依托翻译这个媒介来跨越语言和文化交流的隔阂，进而完成相应的任务。《圣经》翻译、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等均见证早期的西方文明及西方翻译史。中西翻译活动经历了各具特色但又具相似性的发展阶段。例如，中西翻译活动初期大都与宗教文献相关，包括中国的佛典翻译、西方的《圣经》翻译，但它们在翻译策略、社会功能和影响力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其他的翻译类型与此类宗教文献的翻译情况相似。中西翻译传统话语、翻译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同样经历不同的阶段，伴随着翻译实践而不断地演进与发展，这可以从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的《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1997)、马祖毅编著的《中国翻译通史》(2006)及其他的翻译史、翻译理论史等著作获得证明。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呼声日益高涨，

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之一詹姆斯·霍姆斯(James S. Holmes)在1972年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了里程碑性的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意味着翻译学这一学科进入了当代翻译学发展阶段。之后，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的各分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甚至出现了“文化转向”“伦理转向”“意识形态转向”，以及“新的认知范式”和“社会转向”等，近十年出现了“回归语言学”的呼声。(Snell-hornby, 2006; Wolf & Fukari, 2007: 173)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翻译学吸收或涉及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文体学、心理学、思维学、符号学、信息学、文学、教学法、术语学、诠释学、语料库语言学、人工智能与机器翻译，乃至数学、逻辑学等学科的理论原则，并拓展至和合学、神经心理学、认知诗学、认知叙事学、生态学、生态伦理学、模因学、传播学(熵论)、地理学等界面，不断呈现跨学科的性质，成为与多种学科相互关联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交叉学科，而且，其学科地位不断提高。

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人们不断思考翻译的本质，探索翻译主体、客体的互文关系及相关的因素，寻求民族语言和文化沟通的理想途径，并将这些思辨升华至翻译话语、翻译理论；与此同时，哲学家、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家或者关注翻译行为的哲学观，或者强调哲学世界观对翻译实践、翻译理论构建的影响，并对翻译研究进行反思，考察翻译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论、翻译方法、翻译效用的可靠性等问题，诸如西方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等值与等效之争，中国的“文质”之争，“神似”与“形似”之争，等等。基于对翻译实践的认识以及翻译思想或翻译话语、翻译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背景，中西译学各自形成并蕴涵着相似的或不同的翻译哲学观。

比较翻译学注重通过比较或者对比的方式比较分析译作、不同翻译传统和不同译论体系，系统描述翻译转换与比较规律。不少学者指出，要重视翻译学的哲学层面的研究，例如，霍姆斯曾提及要重视元理论的研究，因翻译研究的哲学层属于学科的最高层；中西译学的比较研究也不例外，即要重视哲学维度的比较分析。我们知道，中西翻译实践及译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及其背后的哲学根源具有共性和个性，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主体论、过程论、美学论、价值论等层面具有相似点和相异之处，反映其背后的社会政治、价值体系、语言文化、译者思维

等内涵。本书将从哲学维度,史论结合,对翻译、翻译理论、翻译流派进行分类、归纳,较系统地比较中西译学,考察传统翻译话语、现当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学构建背后的发展动因。

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从本体论、认识论出发,回顾翻译学的哲学介入的传统,梳理对西方译学反思的主要观点及对翻译学哲学视角的总体思考;描述中西翻译学的构建框架、翻译哲学与比较翻译学的内涵及哲学维度的中西翻译学的比较范围和比较方法;追溯翻译的本源,归纳“翻译”的定义,深入探索翻译的本质。

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核心部分,主要从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开展论述。第四章以中西译学范式为主题,追溯其背后的哲学根源,对中国译学范式的分析主要基于各时期具有显著特征的翻译类型,例如“弘扬宗教型”“经世致用型”“富国强兵型”“开启民智型”和“配合国情型”等,论及这些类型所体现的翻译话语、哲学根源;与之比较,概述西方译学范式或者说翻译流派的核心观点,并将其归纳为“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对等”“不可译”“意译-直译”和“一切书写都是翻译”五大主题因子。第五章回顾中西翻译学的方法论及研究方法,从新的视角重写中国译学的翻译模式,建构“格义”“达旨”和“文化会通”三条翻译主线和译论发展主线;针对西方译学的研究路径,从规定、描写和解释三大研究途径进行论述,分析三个各具特征的翻译模式:“杰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

第六章从主体论出发,比较中西译学的译者主体理论及中西不同翻译实践中的翻译主体、译者地位、身份。第七章从过程论出发,描述过程翻译学框架、翻译过程的定义,描述一些典型的翻译模式和认知过程模式,展现本领域的最新成果。

第八章为结论部分,在归纳中西译学比较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中西译学的研究重点,指出译学与哲学或翻译哲学应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应重视“知行合一”与“体用合一”、“学”与“术”相结合、本土化与全球化视野相融合、研究途径的互补与融合,继续走跨学科的发展路径。

翻译哲学、比较翻译学等学科日益受到重视,要求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中。中西译学的比较要求我们通过比较辨别各自的精华与不足,采取相应的引进和创生策略,避免中心-边缘的极端走向;而且,要避免通过寻找中西术语、概念对应物的方式来得出中西翻译传统的异

同,要挖掘中西译学相似性背后的本质,探索其背后中的“异”,进而真正把握中国的传统、西方的传统,从而找到继承、借鉴、引进和创新的立足点。换言之,研究者要在注意共性的同时,关注民族语言的特性,针对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提出切合实际的翻译理论,或者说在翻译实践中凝练和升华翻译理论和理论体系;例如,《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时期到佛典翻译》等著作从不同的视角勾勒出中国翻译话语,并将中国翻译话语推向国际翻译研究的舞台。

处在新时期的中西文化构建与文化认同的交汇、碰撞与交融当中,翻译学界面临新的任务,学者们应有强烈的文化自觉,立足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传统哲学与经典文论,从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现实出发,在把握各自学术理论体系精神的基础上,构建新型的翻译话语;中国译学的建设与发展更应如此。总而言之,中西译学的比较研究,包括哲学、理论、应用等维度的比较研究,不应为了比较而比较,而是通过比较,发现中西译学的不同之处与相似之处,以便会通中西译学,寻求可对话的空间以及双方互补和融通的路径,其目的是克服各种译论存在的不足,探索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创造出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或理论框架。

目 录

前言	i
目录	v
第一章 引言	1
1.1 翻译学的哲学介入传统	1
1.2 对西方翻译学的哲学思辨	7
1.3 对翻译学哲学视角的总体思考	10
第二章 翻译哲学与比较翻译学	12
2.1 翻译学框架	12
2.1.1 中国翻译学框架	12
2.1.2 西方翻译学框架	17
2.2 翻译哲学	21
2.2.1 翻译与哲学的关系	21
2.2.2 “翻译哲学”的内涵	22
2.3 比较翻译学	24
2.3.1 比较翻译学框架	24
2.3.2 比较翻译学的比较范围	26
2.4 中西翻译学的哲学思想比较内涵	27
2.4.1 中西翻译学比较的本体	27
2.4.2 翻译哲学视角下的中西翻译学比较维度	28
第三章 中西翻译学的“翻译”本质	31
3.1 翻译的定义与分类	31

3.1.1	翻译的定义	31
3.1.2	翻译的分类	38
3.2	翻译本质再思	40
3.2.1	翻译的本体与本质	40
3.2.2	“翻译”本质的再解构	43
第四章	中西翻译学的范式研究	51
4.1	中国翻译学范式及其哲学思想	51
4.1.1	中国翻译学范式	51
4.1.2	中国翻译学范式的哲学思辨	84
4.2	西方翻译学范式及其哲学思想	94
4.2.1	西方翻译学流派	94
4.2.2	西方翻译学的哲学视角	116
第五章	中西翻译学的方法论研究	130
5.1	翻译学的方法论	130
5.1.1	翻译学方法论的内涵	130
5.1.2	翻译学的研究方法	133
5.2	中国翻译学的翻译模式	137
5.2.1	“格义”翻译模式	137
5.2.2	“达旨”翻译模式	145
5.2.3	“文化会通”翻译模式	152
5.3	西方翻译学的研究途径	159
5.3.1	规定、描写与解释	159
5.3.2	西方翻译模式	165
第六章	中西翻译学的译者主体研究	168
6.1	中国翻译学的译者主体论	168
6.1.1	佛经翻译时期至西学东渐时期的译者主体论	168
6.1.2	五四运动时期前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译者主体论	171

6.1.3 当代译者主体论·····	174
6.2 西方翻译学的译者主体论·····	175
6.2.1 被压制的译者身份·····	175
6.2.2 翻译创作、诠释与解构的译者介入·····	176
6.2.3 功能与文化研究：译者登场·····	179
第七章 中西翻译学的翻译过程研究 ·····	186
7.1 过程翻译学概述·····	186
7.1.1 过程翻译学·····	186
7.1.2 翻译过程的定义·····	188
7.2 中国翻译学的过程论·····	188
7.2.1 传统翻译过程论·····	188
7.2.2 现当代翻译过程论·····	190
7.3 西方翻译学的过程论·····	193
7.3.1 西方翻译学各流派的过程论·····	193
7.3.2 翻译的认知过程模式·····	196
第八章 翻译哲学视角下中西翻译学前瞻 ·····	201
8.1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创新·····	201
8.1.1 中西翻译学发展的共性和个性·····	201
8.1.2 西方译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发展·····	203
8.2 中西翻译学的发展与研究前瞻·····	206
8.2.1 中西翻译学的融合·····	206
8.2.2 未来中西翻译学的发展趋势·····	209
参考文献 ·····	212
后记 ·····	237

引言

1.1 翻译学的哲学介入传统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人们不断思考翻译的本质，开展翻译研究，探索翻译的运作机制及其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哲学、社会、文化等因素，从哲学、理论及理论应用等层面思考和构建翻译理论。哲学层面上，“翻译是一种人类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是一个不断由发展中的无数相对真理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江治刚和李军花，2006：62）从宏观上看，翻译被视为一种哲学活动，反过来，从哲学层面看待翻译也是非常重要的。（柯文礼，1999：81）

翻译学建设要求对其哲学根源进行思辨。正如英国学者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所言：“哲学问题是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Newmark，2001a）哲学与翻译理论关系密切，翻译理论包含或借助哲学方法论的运用，某种程度上，哲学的世界观直接影响或成为翻译学的方法论，翻译理论与哲学世界观在决定翻译方式上拥有共同的假设。潘文国先生指出，从哲学层面对翻译学开展研究属于翻译学研究的最高层面，接着的层面是理论层、应用层和技巧层。（潘文国和谭慧敏，2006：190-191）翻译学的探索与构建要求从最高层的哲学层面出发，以更好地透视和解决翻译现象及翻译问题，把握翻译学的本质，提出更具普遍性的翻译理论。

翻译哲学，或者说从哲学视角考察翻译活动可以追溯到哲学的“语言转向”。从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编的《翻译、历史与文

化论集》(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 1992)、雷纳·舒尔特和约翰·毕格奈(Rainer Schulte & John Biguenet)编的《翻译理论:从德莱顿到德里达论文选》(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1992)、道格拉斯·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的《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1997)等著作发现,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公元前43)、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 1478—1535)、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43)、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61)等西方哲学家的论说对翻译学的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朱湘军的博士论文《从客体到主体——西方翻译研究的哲学之路》(2006)从“可译性——翻译本质的哲学观”“翻译即理解”“翻译即换符”“翻译即译义”“翻译即重构”以及“翻译即征服/操纵、改写”等方面回顾了西方翻译研究所经历的哲学路径。

《尚书大传》记载了中国周代的口译现象:“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从张佩瑶教授译著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从最早期到佛典翻译》(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1: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2006)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典籍包括孔颖达的《礼记·正义》、贾公彦的《周礼义疏》、赞宁的《译经篇》、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其他的儒道经典均论及了翻译官职和翻译的本质。例如,关于翻译的名实、言意、象意等语言观,荀子在《正名》中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墨子在《经上》对“名”“实”进行了解释:“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道德经》说:“名,可名,非常名。”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春秋谷梁传》记载了孔子的“名从主人”的译名原则。(陈福康，1992b：13)

不同历史时期，哲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侧重点论述了翻译哲学的问题，哲学家强调翻译行为的哲学本质，而翻译理论家则强调哲学世界观对翻译理论构建的影响。例如，在近现代，《谈翻译》(艾思奇，2009)、《论翻译》(贺麟，2009a)、《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译序》(陈康，1942)、《谈翻译》(朱光潜，2009)、《论翻译》(金岳霖，2009)、《“金岳霖论翻译”读后》(柯飞，1987)、《关于翻译的哲学思考》(柯飞，1996)、《试论翻译哲学》(刘邦凡，1999)、《翻译研究理论方法的哲学范式——翻译学方法论之一》(姜秋霞和杨平，2004)等论作，以及《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孙致礼，1999)、《翻译与语言哲学》(刘宓庆，2001)、《翻译的本体论研究》(蔡新乐，2005)、《巴别塔的重建与解构》(李河，2005)、《翻译的哲学方面》(单继刚，2007a)、《翻译学的语言哲学基础》(黄振定，2007)、《翻译学的哲学视野》(董明，2011)等专著基于哲学视角考察了翻译问题以及哲学与翻译、翻译理论的关系。

哲学家贺麟较早地论述了“翻译哲学”的内涵：“从哲学上讲，所谓翻译又是什么意思呢？翻译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这种活动包含了理解、解读、领会、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贺麟，2006：43-44)贺麟强调的是译者、原语和译语之间的交流过程。黄忠廉教授指出：“翻译哲学是系统化和理论化了的翻译观。翻译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译者思维同翻译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黄忠廉，1998：56-57)可见，翻译哲学不仅涉及语言、文化转换，还涉及翻译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翻译哲学不是简单的“翻译加上哲学”，从其本质看它是用某种哲学理论去评价翻译及其理论。(刘邦凡，1999：58-61)基于翻译的认识论，贺麟指出：“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物’、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亦为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即可用无限多的语言去发挥表达之处。”(贺麟，2009a：517-523)贺麟的翻译哲学观强调翻译之所以成为翻译的本质以及翻译成为可能的根源。

关于翻译哲学的本质与范围。刘邦凡教授说：“翻译哲学的基本问题

是译者思维与文本(包括言语)之间的关系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思维与外物(语言文字、言语、符号等外在之物,并不要求是物质性的,只要求相对于某一个体思维之外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其中的关系必然是在主观世界(译者世界、读者世界)和客观世界(原文世界和译文世界)之间的,译者世界、读者世界、原文世界、译文世界构成一个四维性关系世界或关系网络,弄清这些关系,分析出脉络与头绪,找出一个通道与联结点(或联结线或联系面或联结体)正是翻译的根本任务。”翻译哲学属于分析哲学的范畴,它是翻译的过程、技巧、方法、方式、层次、原理、价值、本质、心理、道德等一系列问题的所谓一般性的总的看法。它离不开人们的抽象与概括,是人们对翻译实践具体分析的结果。同时,翻译哲学至少包含两个研究对象:翻译与翻译理论。翻译作为翻译哲学的直接对象,形成对翻译的直观的实证的哲学认识(分析),翻译理论是翻译哲学的间接对象,形成对翻译的总体的理论性的哲学认识(分析)。(刘邦凡,1999:58-61)

简而言之,翻译哲学是考察译者思维与翻译主客体之间互动关系的问题,以辩证的思维推动翻译学的合理构建与发展。翻译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找出或确立译者思维与文本、译者与原文之间的关系,论证和分析翻译、翻译理论。从翻译哲学出发考察翻译理论及其哲学和翻译现象,将有利于全面认识翻译学并进行合理的建构,例如,对语言转向的分析有助于把握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

中国古代翻译话语已论及翻译的语言观,就西方翻译哲学而言,翻译与翻译研究还涉及翻译的语言世界观、具体的语言特征和语言分析等。语言世界观由德国哲学家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提出,用来解释语言、思维和现实的关系,强调语言的差异及其与民族精神的关系。语言的差异影响着翻译的再现及其语言表达形式,译者可能为了达到某种翻译目的而实施操纵,以获得体现不同民族精神的翻译;翻译成为语言世界观转换的方式。当然,讲不同语言和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进行交际,以及一种语言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关键在于人类具有共性。这一共性为翻译和翻译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翻译的语言世界观不仅体现民族的精神,而且影响到翻译学科的建设。刘宓庆先生指出:“我们必须建立科学的语言观,才能使翻译语言学

建筑在既符合语言科学规律,又符合中国翻译的语言实际的基础之上”,而“语言科学应既注重语言的同质性,又注重语言的异质性,同、异结合不可偏废;同质性研究是对人类语言普遍规律的本体论探索,异质性是对人类语言‘个别实体’的特殊性观照”。(刘宓庆,2001:127-148)根据语言的异同性,刘宓庆分析了汉语与英语的特征、语言哲学中的各种意义观包括指称论、观念论、语用、符号论与翻译活动之间的关系,而且挖掘了中国译学的意义理论,从译学的认识论视角考察翻译中意义的特征、意义获得的途径、意义的表现、意义传递的对策等,以及翻译中的思维特征和语言逻辑等问题。

《翻译学的语言哲学基础》(黄振定,2007)探索了翻译学、语言学和哲学的根本性问题。该著作将作为特殊语言活动的翻译与一般语言活动结合起来,从西方哲学史和西方普通语言学史出发,分析有关西方哲学家对语言活动的普遍规律,语言现象中的各种矛盾以及与翻译活动的关系,论述了翻译活动的特殊规律、本质和原理,探寻翻译学建设的哲学基础。从语言哲学观出发,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语言在文化传递当中起关键的作用,而哲学的可能世界代表着语言的可能世界,语言的任何变化都可通过哲学得到合理的解释。(董务刚,2004:111-116)显然,语言世界观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哲学思考的路径,启发从翻译的根本来反思翻译的思维与外物之间的关系。

翻译问题要求采用辩证的分析方法。《翻译学的辩证逻辑学派》(田菱,1992)一文指出,科学研究的方法有三个层面: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科学方法,建议从翻译学的方法论、领域论、本质论、标准论、可译论和风格论建构辩证逻辑学派。《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黄振定,2008)基于某一哲学观点辩证思考翻译学的性质与建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王宏印,2003)的第七章专门论述了“翻译之是否可能的哲学沉思:贺麟论翻译的‘言意之辩’”,解释了胡怀琛和郑振铎的文学可译论、贺麟的“言意之辩”以及金岳霖的“译味与译意”。《翻译论》(许钧,2003a)的第五章“翻译矛盾论”从翻译矛盾辩证观出发,论述了可译与不可译、异与同、形与神的矛盾关系。《翻译与诠释》(王宾,2006)讨论了不可译性的问题。

有关文学翻译的哲学问题,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将翻译哲学归结为“美化之艺术”,构建了文学翻译的认识论、目的论与方法论。他还

辩证地分析了翻译中的几对矛盾：理解与表达的矛盾，忠实与通顺的矛盾，直译与意译的矛盾。（许渊冲，2006：169-177）孙致礼教授概述了文学翻译的种种矛盾，包括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矛盾，“神似”与“形似”的矛盾等。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有助于解决各种翻译现象的问题（孙致礼，1999）。王向远和陈言教授全面地回顾中国百年文学翻译的争论及其背后的哲学思辨（王向远和陈言，2006）。

面对种种翻译争论或翻译观，我们要辩证地考察中国翻译学或者说中国传统译论的哲学基础、发展模式。例如，罗新璋先生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基于中国译论的发展理念，挖掘中国译论的哲学根源，构建中国译论发展体系。就中国传统译论而言，它是以中国传统哲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著名学者杨自俭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是民族的哲学，其他各学科都要受到哲学的制约，……也会影响到中西译学范畴的建构、确立与发展。”（王宏印，2003）他认为，只有从哲学范畴、译学范畴和译学范畴体系出发开展中西比较研究才能打破原来的局面。事实上，潘文国（2009）、郑海凌（2000）、王宏印（2003）、杨晓荣（2005）、蔡新乐（2005）等学者就中国传统、现当代译论的哲学思辨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包括对直译意译之矛盾、“中庸”“言不尽意”“和谐”“第三条道路”等哲学思想的讨论。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翻译学明显受超验主义、解构主义、怀疑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影响。翻译学中的超验主义把原文意义看成一个超越时空、超越语言的不变实体；解构主义否定原作超验特性；怀疑主义质疑和否定翻译活动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实用主义要求翻译理论研究都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申连云和张少雄，2005：45）李林波博士在《中国新时期翻译研究考察：1981—2003》（2007）中归纳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各种哲学模式：①采用某种哲学研究模式或某种哲学理论解决翻译问题；②从翻译视角探讨哲学问题，这个问题较少论及；③对翻译问题开展形而上的思辨。显然，各种翻译研究思想或思潮均有其哲学基础，而翻译研究要求唯物辩证法的介入，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翻译学本身及其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等现象，理清、总结和评述翻译及翻译理论中的各